

明代西安人居环境的初步研究

——以园林绿化为主

史红帅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 北京, 100871)

提 要 本文利用相关史志资料, 深入探讨了明代西安城及其郊区园林绿化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水源基础、园林绿化的基本类型、景观特征以及城市街区的绿化概况, 充分展现了明代西安在园林绿化建设上的辉煌成就,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明代西安作为西北重镇的园林景观面貌与人居环境状况, 旨在为西安城市与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明代 西安 园林 绿化 景观

城市的人居环境是由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期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园林绿化则是其最具表现力的部分之一。明代西安虽然有着城高池深、驻军众多以及城中之城的重城结构等显著军事特征^①, 但作为城市人居环境中最富生机与活力的园林绿化却展现了这一时期西安自然与人文环境紧密结合的独特一面。郊区作为城市生活开展和依托的重要区域, 有明一代也兴建有不少颇具特色的园林, 而且绿化带的建设也颇有成就。关于明代西安城乡园林绿化建设、发展等人居环境问题, 因史料匮乏目前尚缺乏专门论述, 很多相关论著在论及明代陕西或者西安园林绿化时均极为简约^②, 本文即试图对此作系统研究, 抛砖引玉, 希望有助于明代西安城市与周边地区景观及环境变迁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 历史时期西安(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兴建园林的传统 自然环境条件及明代西安城乡园林兴盛的水源基础

1 明以前各代在西安(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园林绿化的悠远传统

西安(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 一般认为最早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周文王于都城丰京一带所建的“灵囿”, 园内有“灵台”、“灵沼”等景致, 已初具园林雏形, 这不但是陕西园林的

① 吴宏岐、党安荣:《关于明代西安秦王府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

② (日)冈大路著、常瀛生译:《中国宫苑园林史考》(农业出版社, 1988年, 第202页)有专章为“明代)陕西的园林”, 但对西安城市园林却仅提及一“最乐园”;周云庵《陕西园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对明清西安园林论述更为简略, 极易使人误认为这一时期西安园林甚少建树。

肇始,亦是中國園林營建的源頭所在。秦漢時代,嬴秦建於渭水之南的上林苑、阿房宮及漢長安城中的長樂、未央、建章等宮殿均是這一時期園林(或園林化建築)中的典範之作,池台亭閣,無一不備。除遍布池沼亭榭、樓閣殿宇、珍禽異獸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之外,漢長安城的四郊之地還建有大量的皇家苑囿,著名者如御宿苑、博望苑、宜春下苑等等。自東漢以至於南北朝時代,西安地區的園林建設雖因社會動蕩而建樹不大,但後秦姚萇都於長安時,仍建有名噪一時的逍遙園,作為西來高僧鳩摩羅什講經、譯經之所,也略可體現這一時期西安園林建設的成就。由隋代起長安復為都城,園林建設又開始再度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隋大興城北有大興苑,南有芙蓉園(即曲江),唐長安城內的興慶宮及城東華清宮等皇家园林,九曲池、定昆池、太平公主南莊、長寧公主東莊、何將軍山林、郭子儀園等城郊私家园林,公共園林曲江池及眾多寺觀園林等的興建均反映出中國古典園林建設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元時的長安(奉元路)城雖不復為都,然仍不失其西北重鎮地位,園林的興建也甚可觀。宋代城內以寇准宅、種放宅等私家园林及清蓮堂等官府園林為代表,元代則以城東北雄偉壯麗的安西王宮、南郊樊川幽雅別致的胡相別墅、廉相泉園、趙氏別墅等私宅園林為翹楚^①。

2 西安(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區園林綠化建設的自然環境條件

歷史時期西安地區城鄉園林綠化建設有着良好的自然環境條件。

首先,充裕的水源為山水園林的興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础。東漢班固《西都賦》中即有西安周邊“蕩蕩乎八川分流”的吟咏。“八水繞長安”的形勢不僅造成一種軍事防禦上的“金湯”之勢,而且為園林的興起提供了丰沛的構景水源。所謂“關內大川據天下上流,而西安實為八川所繞,高源下澤,結綯其間,鍾水丰物,号称陸海。自西周而後歷代建都,引諸川,……而滋苑囿”^②。水源對園林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西安雖地處西北半濕潤半干旱區,但周邊河流眾多,泉沼遍布,這不僅從整體上有益于西安地區小氣候的改善,而且在地貌景觀上也便于園林建設時丰富其景觀層次。多水的自然環境使西安的園林建設及其景觀面貌在西北地區各城市中罕有其比,獨樹一幟。

其次,西安地區平坦與起伏相融、大川與高原相间的地形為園林綠化建設提供了足資伸展的舞台。城內地勢平坦舒緩而有帶狀起伏,郊區則川原相间,高下相宜。西安諸原或高大雄偉,氣勢磅礴,或突兀高起,小巧玲瓏,或狹長如帶,曲折有致;原間川谷則廣闊通达,多有河流泉沼,地形起伏明顯。基於城鄉地形的差異,分布其中的園林景觀便呈現出不同的特色。西安城及其周邊地區地形素有“几終南、屏渭水,帶五岡、襟三川、灃、灊左纏、高、驪右抱”之稱,這正是園林綠化興起的良好地形條件。

另外,渭河平原正處於秦嶺這一中國南北氣候、降雨、動植物分布等地理分界線的北側,無論是在植物品種的多样性,還是動物的適應性方面,本區都同時兼有南北的特性,具有明顯的過渡帶特征,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園林景觀更易達到多样化的面貌,不但植物品種丰富異常,就是各地珍禽異獸也都能畜養其中。

3 明代西安城鄉園林綠化建設的水源基础

西安地處渭河谷地,東有灃、灃,西有沣、滈,發源于秦嶺南麓的多條河流環其周圍,自南而

① 乾隆《西安府志》卷 58《古迹志·第宅》。

② 乾隆《西安府志》卷 5《大川志》。

北流入渭河,水文环境较之西北地区其他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为明代园林绿化建设在唐以后的又一次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众多西北城市相仿佛,西安城内部缺乏天然河沼,然而要营建风景如画的城市山水园林,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园林中是否挖凿有一定面积的池塘水沼,毕竟,水面是西北城市园林中最重要的构景要素之一。园林池沼用水量往往较大,而城内井泉之水又多不敷用,由此便对引城外河水入城以供园宅美化之用提出了迫切要求。明代开凿人工渠道引城外河流入城虽然稍逊于隋唐时的盛况,但在宋元时代的渠道基础上又有创举,开渠成就则更胜宋元一筹,城中汲引、防卫、造园等城市水利建设因之兴盛。

明代西安城先后开凿有两条引水渠道,即洪武十二年(1379)开凿的龙首渠和成化元年(1465)开凿的通济渠。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即云:(西安城)“东有龙首,西有永济。”“永济”即通济渠的别名。两渠水网密布城内,不仅利于日常生活及军事防御之用,且使城市园林因水面的点缀而颇具灵气。关于明代两渠的开凿时间、长度、走向、管理等近来已有较多研究^①,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指出的是,两渠引河入城,对明代西安城市园林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其兴废,则直接影响到城市园林的盛衰。此外,两渠水对西安城市园林在明代的发展因其水量、持续长短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影响上的差异。以成化元年(1465)为界,此前龙首渠一枝独秀,在城市饮用水供给、城防、园林绿化等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通济渠一开,其因供水量大而且稳定的优点成为西安的主要供水渠道,龙首渠则或断或续,只起辅助之功。

郊区园林因其地利之便,一般均易利用城外的自然水源,引河作塘,围泉为沼或傍依河道之侧,往往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多不受引水渠道兴废的影响。

明代西安园林及绿化带以分布地域和景观特征而论,可分为城市型与郊区型两大类。

二 明代西安城市园林的主要类型、景观特征及街区绿化

中国园林发轫于先秦时期,经秦汉奠基,魏晋转型,唐宋出现繁荣局面,到明代无论造园的技术性还是艺术性都趋于成熟。西安作为西北重镇,人文昌盛,经济活跃,明代城市园林遂蓬勃兴起,势如雨后春笋。

1 明代西安城市园林绿化的主要类型与景观特征

明代西安城市园林(含园林化建筑)依其所属、功能用途的不同,大致可分为王府园林、官署园林、文教园林、私宅园林、公共园林、寺观园林等类型。

王府园林 自明初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封其次子朱棣为秦王,洪武十一年(1378)进驻城中之城——秦王府城起,此后明宗室郡王、镇国、辅国等将军府遍布城内。至嘉靖年间,西安城内已有9所王府、32所镇国、辅国将军府^②,至万历年间王族后裔已多达1200余人^③,西安因此几可称“宗室之城”。明宗室以其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和经济上享有的诸项特权多在府宅内营建规模较大的园林。此类园林是明代西安城市园林的主体。其中尤以号称“天下第

① 王其祎、周晓薇:《明代西安通济渠的开凿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吴宏岐、史红帅:《关于明清西安龙首、通济二渠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辑。

② 嘉靖《陕西通志》卷《封建·皇明藩封》。

③ 祁恒文:《秦王·秦王府·新城》,载《三秦文史》第3期,陕西省文史研究馆,1990年12月。

一藩封”、“拥货数百万”^①的秦王府城中园林规模最大、布局构景最具匠心、景观层次最为丰富。

秦王府城内部主要可分为三大功能区,自南而北分别为祭祀区(砖城西南部、萧墙灵星门西北)、宫殿区(砖城内大部区域)和园林区(主要在砖城内东、西部及后半部)。

秦王府城不仅专建有风景如画的后花园,为秦府园林的精华所在,从整体上看秦府亦宛如一座大花园(见图1),号称“府城外内,水陆草木之花甚多”^②。

明嘉靖年间陕西左布政使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载秦府砖城内东部“台池鱼鸟之盛”云:“书堂后引渠水为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鱼,从池上击梆,鱼皆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声。池后垒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余,座中设几席,陈图史及珍奇玩好,烂然夺目。石砌遍插奇花异木,方春海棠舒红,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桧青翠,最者千条柏,一本千枝,团栾丛郁,尤为可爱”^③。由此可见秦府园林中池塘的构景之功十分突出,池中鱼莲动静相映,池畔假山亭阁倒映水中,四周花树团簇,品类奇异。成化年间秦简王朱诚泳咏此池塘道:“朱明守夏熏风凉,花开正作黄金妆。红者惟红白者白,宫城十里飘清香。金鱼无数长过尺,出水荷翻尾摇赤……”^④对池旁假山亦赞云“好山四面画屏开,百斛青螺净如洗。……假山虽假有真趣,云影倒蘸涵天光”^⑤。秦府虽处城中,但虽假亦真的山水风光却尽得自然之趣。

书堂周围广植竹林,取意清幽,充分体现了园主的个人情趣与生活品味。秦简王《宾竹轩记》记载了竹林的形成及其中“宾竹轩”的得名,“予书堂之西轩,旧有丛竹,岁久枝叶殄瘁,几无留良焉。乃命侍人悉芟除之,别植数百本,不三二岁,蓊然成林,萧然有洞庭九疑之趣,予甚乐之。……遂颜其轩曰‘宾竹’”^⑥。能“蓊然成林”的竹林规模在这一时期西安乃至西北城市园林中并不多见。

作为秦府园林的主体,后花园规模远较书堂周围园林为大,且畜养孔雀、仙鹤等珍禽。其内“植牡丹数亩,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中畜孔雀数十,飞走呼鸣其间,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⑦。后花园中各色牡丹竟吐嫩蕊,广达数亩,其间孔雀时翔时栖,鸣叫不已。宾客进奉的数只仙鹤也为秦府园林增色不少,“放之庭下自舒逸,有时飞上苍松巅,落地踟蹰如寄傲,风动霜翎舞还蹈……”的诗句正是对仙鹤绰约神姿的生动描绘^⑧。这样声色兼备的园林俨然已具帝王苑囿的气象。

秦府后花园的美景其实远不止此,成化年间秦简王朱诚泳有诗咏云:

“城中寸金营寸土,我爱斯园带花坞。依稀风景小蓬莱,始信神仙有官府。钱刀不惜走天涯,殷勤远致江南花。沿阶异草多葱茏,参天老木何槎牙。谁移泰华终南石,巧作山峰叠青壁。山下池中几种莲,赤白红黄更青碧。金鲤银鲂玳瑁鱼,往来自适恒如如。一点红尘飞不到,水晶宫殿涵清虚。花时最爱花王好,魏紫姚红开更早。玉盘斜莹寿安红,却为迷离被花恼。两行槐幄

① 彭孙贻:《流寇志》卷8

②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9《瑞莲亭记》。

③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2《西游记》。

④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3《临池》。

⑤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3《玩假山池亭》。

⑥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3《后园写景》。

⑦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2《西游记》。康熙《长安县志》卷3《物产》“千条柏,一本千枝,郁茂如盖”。

⑧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3《悼鹤》。

夹高柳,时送清风到户牖。绿荫啼鸟共幽人,爽气自能消宿酒。黄花采采开深秋,满林红叶霜初收。几度醉游明月夜,天香万斛沾轻裘。山头一夜风吹雪,万木萧条寒栗烈。索笑闲寻绿萼梅,三种还分蜡红白。松柏苍苍斑竹青,相看同结岁寒盟。满前好景道不得,四时诗兴还相萦……”^①。

虽然文学化的描述难免夸张,但从中依然可看出秦府园林在四季轮替中的景观变迁。春天的万紫千红,夏天的绿荫覆地,秋天的红叶黄菊,冬天的红梅傲雪,使秦府园中四季风景均有引人入胜之处。

秦王府园林营建规模之大,也可从其中动植物及建筑材料的来源看出。不仅孔雀、仙鹤来自南方,园中花草也是“钱刀不惜走天涯,殷勤远致江南花”而得来。累叠假山之石源出“秦华”^②,千竿翠竹移自“渭川”,由此形成的园林面貌自然较城内其他园林更为丰富多彩。

秦府城双重城墙(即外城“萧墙”和内城“砖城”)之间开掘有护城河环绕。有明一代,其军事意义相对较弱,而成为秦王着力营造的大规模园林化区域。

成化年间秦简王营造尤多,引龙首、通济渠水入城河中,形成深三丈、宽五丈、周长超过五里的水面^③。城河中种植莲花,建造亭台阁榭,实为西安酷暑之季消凉纳暑的佳地。秦简王称其景色可与西湖相媲美,“予府第子城外,旧还以堑,引龙首渠水注焉。岁久渠防弗治,水来益微,堑遂涸矣。弘治壬子春,监司修举水利,渠防再饬,堑水乃通,盖一二十年,平陆复为澄波也。予喜甚,遂命吏植莲其中。复即体仁门外为亭,水中以寓目。亭之北则旧有长廊十余间,牖皆南向,与亭相对而连属焉。是岁夏季,莲乃盛开,……花香袭人,端可与西湖较胜负”^④。秦府护城河园林化的一大特色在于以莲花和水景取胜,朱诚泳在《瑞莲亭记》中即云“予府城外内,水陆草木之花甚多,而莲品为尤甚。一日偶至体仁门之南廊,俯瞰清冷芳敷掩映朱华,绿带缘沟覆池,乃饰左右廊其室为亭,将与知音者赏之。亭成,有嘉莲产池中,两歧同干,并蒂交辉,光彩夺目,臣民观者为之色动”^⑤。

从秦简王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秦府园林还有东园、西园及南园之分^⑥,但要确切指出各自的分布、范围大小、内部布局已不可能,我们只能由此推测秦府园林景观实际上远比上述描绘还要引人入胜。城西北隅的最乐园(约今莲湖公园西南)属秦府的一处离园,其布局、规模等已不可考,仅知“在县治西北隅,明秦藩游宴之所,中有台池花榭,名曰最乐”^⑦。依其位置而言,其中池塘当是引城西通济渠水而成。

①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 3《后园写景》。

②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 2《假山》“凿破莲花第一峰,为吾移来置庭除。”又卷 4《假山》有“凿破终南骨,移来置广庭”之句。

③ 《明太祖实录》卷 60 万历重修《明会典》卷 181载“秦府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以当时情况推测,秦府城河似不可能宽于西安大城河(八丈),此处以五丈为准。

④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 4《瑞莲诗序》。

⑤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 4《建置志上》。

⑥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 7。

⑦ 康熙《长安县志》卷《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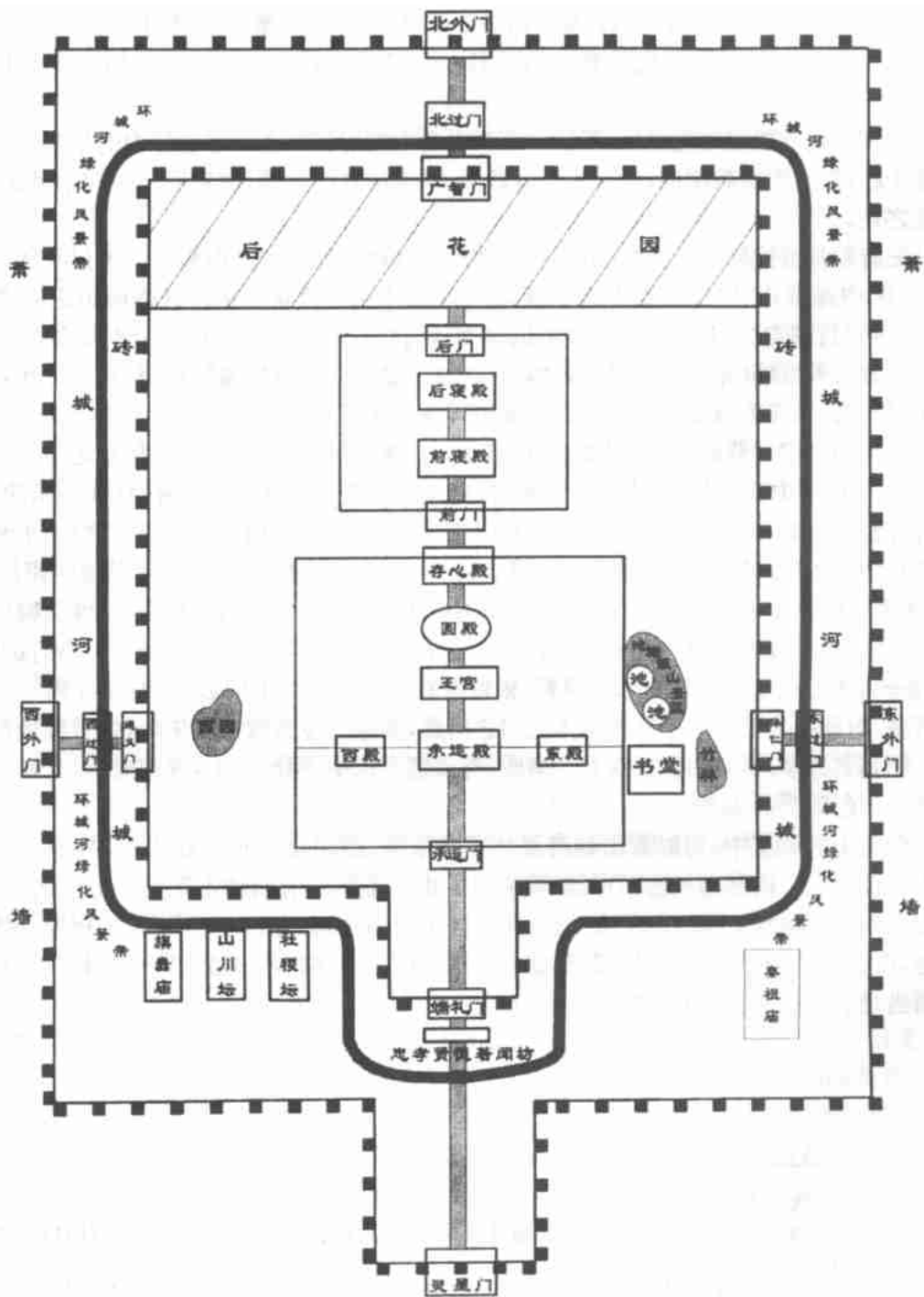


图 1 明代西安秦王府城内部布局及其绿化示意图

秦府之外,城内八所郡王府及镇国将军府等在营建过程中也均多有园林化的建设,其中永寿王府以“涵碧池”和“涌金桥”为核心构建的水景园林流光溢彩,临潼王府则以敕修之“假山水

池”及览秀楼、养性斋等让人流连忘返。明代西安城内郡王府园林面貌笔者另有专文探讨,兹不赘述^①。

明代王府园林大抵说来,构园有成法而无定式,基本准则在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即以客观存在的模山范水为蓝本,经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移天缩地”于有限的范围之内,将山光水色、四时物象荟萃在一起,使人“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领略“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景致神韵。

明时龙首、通济二渠被引入城中,各郡王府均有引入,结合雍正《陕西通志》卷 3《水利一》及其《西安府龙首、通济两渠图》和明人王恕《修龙首、通济二渠碑记》^② 综合分析,龙首渠被引入临潼王府、郃阳王府、永兴王府、开阳王府,通济渠则被引入宜川王府、兴平王府、永寿王府、保安王府、永兴王府。引入之水除饮用等生活用途外,更多用于修建池塘,美化园宅,因而各郡王府就成为当时的用水大户,这可从明成化元年通济渠开凿之后陕西巡抚项忠、西安知府余子俊等制定的渠道管理制度得到明证:“各府分水入内校尉人等,不系统属分水去处。井口各置锁钥,令当地看管人户收掌,量宜将闸以时启闭,不宜听伊专利”^③。限于各郡王府园林的相关记载十分缺乏,微观的园林面貌已很难恢复,实际的园林美景当比上述描绘更为引人入胜。

就自然环境而言,西安城地处黄土高原南缘,城内缺乏自然湖泊、山岭等,若要在城内营建园林,惟有引水为池,形成或大或小的水面,围绕水体构筑园林,在北方园林的雄浑之外凸现灵动,方能给人以耳目一新、超然脱俗的感觉。上述郡王府园林在规划营建过程中无疑都贯彻了这一思想,对水的利用煞费苦心。

入清之后,秦王府成为清军八旗教场所在地,昔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园林繁华如烟而逝。永兴、宜川、临潼郡王府分别成为清提督中军教场、军门教场及镶红、镶白旗驻地,其中园林的衰败在所难免。保安、兴平、永寿、郃阳、开阳郡王府分别为清会府、总督署、内院署、汉提督府、满提督府沿用,园林当有所保存,但比之明代,也均渐渐趋于衰败。

官署园林 明代西安城内官署也多有园林化建设的举措,只是限于所谓“清明廉洁”的为官准则和大明律法的约束,一般都较为简易,但楼宇、池亭、花草的搭配仍能看出园林化的特色。明张瀚《松窗梦语》载,“都察院近城西北,院有楼七间,遥望终南。而西有二池,水接终南龙首,城中灌汲,咸藉于此。”又“蕃司在城东南,后堂有玄石一块,盖一亭覆之,名曰‘定官石’”。位于西门外的琉璃局,因与通济渠相通,其中景致在官署中最为秀美,“西门琉璃局,台榭迤邐,花木繁茂,而渠水曲折,来自终南,由局入城,长流不竭”^④。张瀚亦有诗吟咏陕西布政使署的风光,“官舍枕高冈,南山对郁苍。地偏人习静,政简日舒长。泉引天池液,花分玉井香”^⑤。又据乾隆《西安府志》,“巡抚布院署(即今北院)在府治北,明宣德七年(1432)建,嘉靖二十一年(1542)巡抚赵廷瑞增修,复导通济渠由西垣入,东垣出”^⑥。通济渠水被引入其中,用途之一当是造池作塘,植树种花,美化衙署环境。

① 详见拙作《明代西安城内皇室宗族府宅的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3月第1辑。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3《艺文·碑》。

③ (明)项忠:《新开通济渠碑记》,陕西师范大学馆藏碑拓本。

④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2《西游记》。

⑤ (明)张瀚:《奚囊蠹余》卷4《自华山移莲花小池中花开对酒漫赋》。

⑥ 乾隆《西安府志》卷9。

文教园林 明代西安文教园林主要包括书院和府县学园林,出于教化的性质,儒学的环境建设为促进学子研读和修德立身,也向着园林化的方向发展。西安的文教区作为明代重要的城市功能分区之一,逐渐形成于今三学街一带的城东南隅,以文庙为中心,西有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关中书院,东有咸宁县学。

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关中书院是学校环境园林化的典范,无论是建筑的严整布局,或是园中小品的巧妙搭配,均堪称道。时为书院主讲的名士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记》中备载其环境的园林化特色,“讲堂六楹,诸公扁曰‘允执’,盖取关中‘中’字意也,左右各为屋四楹,皆南向若翼,东西号房各六楹。堂后假山一座,三峰耸翠,宛然一小华岳也。堂前方塘半亩,竖亭于中,砌石为桥。偏西南数十武(注:“武”在古时为半步),掘井及泉,引水注塘,并覆以亭。二门四楹,大门二楹,旧开于南,缘邻官署,冠盖纷还,深山野人,不便厕迹,因改于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颜氏陋巷家法也”^①。

关中书院以允执堂为中心,前有池塘,池中构亭,而以石桥连接,后有宛若华岳的假山,由此形成“背山面水”的独特格局。关中书院因其所处位置偏南,引渠水不便,遂以井水作为池水来源,从而使其景致不会因入城渠水的多寡、兴衰而受到大的影响,其中建筑在讲求对称、礼法的同时又高低错落,有亭有阁,与池塘、花草树木融为一体,园林风格简易质朴而意境高远,以至有“松风明月,鸟语花香,令人有春风舞雪之意”的赞誉^②。关中书院以东又有府、县儒学及文庙等文教之区,其地因是宋元以来的文教区所在,而文庙在明代也是祭祀先贤的祠宇集中之地,故园林化特征极为鲜明,整体绿化程度较高。明正统(1436—1449)年间西安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这一地区遂松柏成林,郁郁苍苍,柏树林街即由此得名。明周宇《修学记》载文教区园林的规模云:“吾西安居省会,郡一邑二故学三,而庙一。……一庙三学,翼比朋翔,乔木联荫,清泮通流,宏观壮观,盖凡为学宫者,或鲜其俦”^③。“庙制宏伟,古柏百余,老槐三,蔚然森秀,皆数百年物”^④。正是文庙园林强调庄严肃穆景观特征的写照。西安府学、咸宁、长安两县学同文庙一样,其中皆有泮池、高大牌坊、亭、斋、魁星楼等建筑物,尤以泮池的构景之功最为显著。泮池均呈半壁型,其中畜养鱼类,种植荷莲,使儒学内的环境氛围平添几许活泼。

私宅园林 明代西安城内居住的社会上层官宦及士人在宅第中多建有小型园林,规模虽不大,但景色宜人,对当时造园手法的运用也相当娴熟。其中以何中丞园林为代表。从张瀚《饮何中丞荷亭分得夏荷二字》诗二首可以约略看出其园林的布局与勾画,“池阁隐城隅,南薰扇长夏。……良辰侈嘉会,招游适休暇。荫树晚凉生,举盏寒浆泻。……”又“雨后芳园润,庭荫上绿莎。槿篱低粉堞,竹迳带清波。碧散牵风苒,红凝挹露荷。林喧求友鸟,池狎换书娥。佳丽西都旧,人文甲第多。远山分太乙,曲水入天河。……同游总陶谢,共和采莲歌”^⑤。限于财力和占地规模,这些园林虽小,但池塘、莲花、小径、矮篱、竹林、亭阁等无一不备,游览其中,似又可见天地之宽,的确达到了造园手法中“一勺代水,一拳代山”,高度浓缩自然风光的境界,使人身处喧

①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6《学校一》引。康熙《长安县志》卷《建置》载“井覆以亭”,似乎更为符合实际。

② 冯从吾:《关中书院记》。

③ 康熙《咸宁县志》卷《艺文》。

④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祠祀考》。

⑤ (明)张瀚:《奚襄蠹余》卷3《饮何中丞荷亭分得夏荷二字》二首。

器城市,却又能享受到自然的山水之乐

公共园林 有明一代莲花池虽同兴庆宫遗址一样是作为秦王府的专属园林,但西安社会上层官宦及文人雅士仍可入内游观,其公共的性质日见浓厚,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公共园林。莲花池的形成与龙首、通济二渠水的灌注密不可分,所谓“明时水满池塘,碧波绿树,涵映虚明,盖以通济渠水灌注之也”^①。实际上在成化元年(1465)之前,莲花池是由龙首渠供水。清康熙初年陕西巡抚贾汉复曾撰文述其景致云“方其盛时,绿茨方塘,碧波数顷,绿舟映带,鸥鹭随行,乃游观之盛区也”^②。莲花池水面广阔,水草浮萍随波逐流,红白各色莲花在水中摇曳摆动,竞吐芳馨;水面上鸥鹭一类水鸟时而飞入高空,时而低飞击水,水中鱼蛙与之相应成辉,泛舟于此,宛如置身江南水乡。池岸四周丛林掩映之中还有秦府香火院之一的莲池寺等精巧建筑。莲花池不仅以其美景引人观赏,而且在当时还有利于排泄龙首、通济二渠的余水,不至过多渠水为患城市。另外,广达数顷的水面也在改善城市湿度、温度、减少风沙等小气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莲花池宛如镶嵌在西安城内的一颗明珠,成为士民休憩游玩的好去处。

莲花池因其“碧波数顷”,需水量极大,井泉根本不敷其用,供水只能依靠龙首、通济二渠水,因而渠道的兴废直接关系到莲花池美景的盛衰。康熙《长安县志》即云:“明末渠塞池涸,水利遂废。”城外水源的断绝直接导致莲花池干涸,贾汉复《放生池碑记》对此有形象描绘:“自渠阻淤,池久涸,瓦砾委焉。”这与渠水畅通时“缘舟映带,鸥鹭随行”的盛况形成何等鲜明地对比。

城东景龙池(即兴庆池)一带为唐长安南内兴庆宫遗址,是南内以水色湖光为主的风景区,池东西 915米,南北 214米,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呈椭圆形状,景致颇富古意,唐时池南的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等楼亭故址更易使观览者发思古之幽情,忆隋唐之雄风。明初即被朱元璋赐给秦愍王作为游赏之所,其间虽几无建设,但作为古迹园林却更有韵味,一花一草仿佛都能让人领略到昔日大唐帝国的风采。景龙池虽也是王府的一处离园,但时人多有入内游赏者,亦可视为公共园林。

秦简王《兴庆池》诗云“绿波流尽草离离,画舫声歌载昔时。海变桑田龙去远,云迷华表鹤归迟。歌台落寞俱陈迹,小殿荒凉有断碑。最恨沿堤杨柳树,临风依旧舞腰肢”^③。实际上此园景色古雅且具宫苑气象,并非如此荒废。嘉靖初年何景明《雍大记》载其景色云“我愍祖之国之初,圣祖赐给(九龙池)以为游赏之所。其间古藤老木,修竹流泉,四时花木甚盛,而牡丹尤多奇品,沉香亭故址犹存,而开元时花盘犹有在者。花萼楼余址尚岿然可观,以未陈请,未敢擅起台榭,姑存其迹而已”^④。明人李苏《游景龙池》诗生动地描绘了其中风景,“和风动高树,烟光满南山。携彼同心友,濯缨绿水湾。遨游唐南内,……俯仰寥廓间。亭台成芜没,流水自潺湲。藤松垂锦幕,花竹长斓斑。白鹭下寒渚,苍庚语绵蛮。……”^⑤。景龙池正处于龙首渠入城必经之地,因此也以水景著称当时,“曲水引龙池,旧苑分花萼”即言此^⑥。

寺观园林 明代西安城内寺观园林主要以清真寺、云居寺(俗称西五台)、东关八仙庵等处

① 康熙《长安县志》卷《古迹》

②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13《古迹一》引贾汉复撰《放生池碑记》

③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兴庆池》。

④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 34《志贲》

⑤ 康熙《咸宁县志》卷《艺文》

⑥ (明)张瀚:《奚囊蠹余》卷 3《上巳景龙池宴集》,《丛书集成续编》144

为代表,这些园林因其清修的要求而注重用建筑、树木的整体布局营造适于敬神拜佛的氛围,对水的构景功能并不过分依赖,因而受渠水兴衰的影响较小

西安城内清真寺兴建之始已难考实,但明代城内清真寺逐渐增多,主要有化觉巷、大学习巷、大皮院、小皮院四座清真寺,各寺园林化建设也多有成就

以化觉巷清真寺为例,明代称清修寺,“自唐迄明六次修建,始有今日之规模,正殿八十四间,可容千人礼拜。……寺院前后大殿五间,中(为省心楼)凤凰亭,最后朝阳殿(即大殿),合称为五凤朝阳殿之意。……院内清洁,修竹茂盛,颇为可观。……三院有南北讲堂各五间,南讲堂为沐浴室,北讲堂为讲经室。四院亦有南北讲堂各五间,中达石栏上即月台而为正殿矣。……寺之四周回民环居数百户,每日前往礼拜听讲,倍极诚笃,聚礼日及开斋节情形尤为热烈也”^①。该寺四进院落,中有木质牌楼、石质牌楼、敕修殿、月碑、省心楼、水房、凤凰亭、望月台等带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物,寺宇宏伟,气势壮观,这些建筑物与寺内的绿树修竹一起体现了与汉文化截然不同的伊斯兰园林景观特征

清真寺的清洁环境是由其性质决定的,有研究者指出,“清真寺既为供给多数同教礼拜真主研究教义之必要场所,在建筑设备上必须有供给大多数同教集合之宽大地盘,宏敞殿宇,方为适宜。尤当清洁,以地不清洁,则不能完成礼拜之功也。……寺宇既以宽豁为主,清净为尚,一切装饰陈设,概属不急之务”^②。不仅清真寺的建筑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教风格,园林环境在总体而言也同佛教寺院有很大的区别,佛教寺院平时以清净为尚,以利修身,而清真寺在平时往往成为普通回民大众的活动、休闲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讲,清真寺又发挥了公共园林的作用。据载“回民在日常生活之外,不能不求消遣,以资调剂,于是武术尚焉。西安回民,无论老幼,多娴武术。每于早祷之后,夜夕之暇,齐集寺院,弹腿打拳,玩枪弄棒,切磋琢磨,互试比赛”^③。这就使清真寺的园林化一定程度上又带有休闲及社区活动中心的意味

云居寺位于西安城西北隅洒金桥北段路西,本是唐长安宫城城墙遗迹,因其台基高阔达25米,可以借此俯瞰四周,渐至有焚香祭祀一类的活动,宋代因台建寺,初称安庆寺,明洪武时重修,取其高耸入云之意而称云居寺。因该寺佛殿依其地势起伏分别建在五个高台上,故俗称西五台,以与终南山之南五台山相对应。其地形特点即所谓“累累如大陵者五,三、四台尤高耸,上建崇阁,供人观眺”^④。康熙《长安县志》亦载“西五台,唐西内城墉故址。……俯视寰宇,佳气翳隆,亦城市之山林也”^⑤。另据乾隆《西安府志》载其沿革及建筑之盛云,“西五台,(鄂海碑记)在城西北隅,是台基于唐,创于宋,屡葺于明。有祷必应,六月大会,岁以为常,……由三天门拾级而上,层台楼阁,环列左右,最高处为大士殿,收一郡之胜”^⑥。云居寺巧借唐内城城基在西北隅高屋建瓴的特殊地势,将佛殿与极具园林化色彩的“崇阁”建于高台之上,同时用大量树木进

① 马希文:《西安化觉寺一周记》,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4页。

② 《清真寺之应用与构成》,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9页。

③ 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3页。

④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13《古迹一》。

⑤ 康熙《长安县志》卷《杂记·古迹》。

⑥ 乾隆《西安府志》卷6《古迹志下·祠宇》。

行绿化,这样就使云居寺既因地势的高耸而与喧嚣繁华的尘世在空间上相隔绝,形成“空中绿岛”的园林意象,并与其东南部低洼平坦的莲花池高下相应,构成城市西北隅的标志性景观,而且有利于寺院建筑以三重天门、层台楼阁等的布设步步向上,从低到高地烘托出崇佛敬神的气氛,最高处设大士殿,就将诸佛的地位推崇到极至,这种因高台而层层布局寺院建筑的方式无疑会使西安士民自下而上登临时更易油然而生崇敬膜拜之心,在城内寺观建筑布局中独一无二。云居寺是佛教建筑与园林绿化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一个典型例证,市民因崇佛敬神而可游赏园林,又因园林之庄严更虔信诚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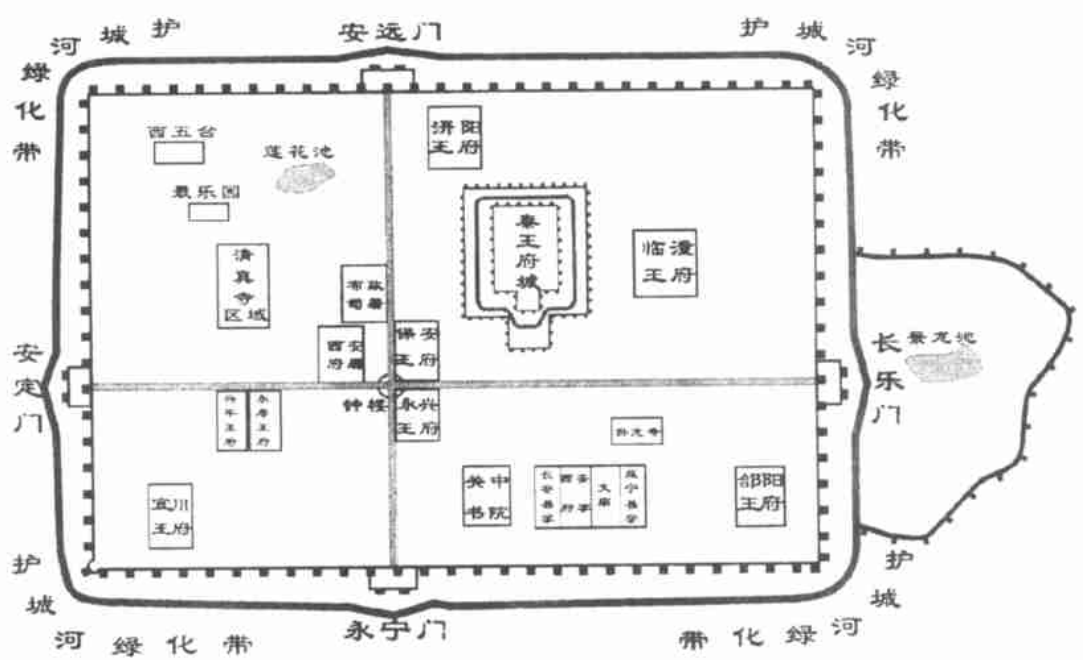


图 2 明代西安城主要园林绿化区(含园林化建筑)分布示意图

2 从地名看明代西安城街区的绿化概况

限于史料记载的匮乏,仅从现存地名来看,明代西安城街区绿化的树种以北方常见的槐树、柳树为主体,亦有枣树、柿树、皂角树等。

普通市民居住区及宅院绿化从实用性来考虑,以槐、枣、柿等树种为多。槐树耐旱,病虫害少,树冠伸展如盖,生长虽慢,然木质坚硬,可做建造屋宇之栋梁,因而素为关中地区宅院的首要绿化树种。从大量唐人诗文中可知隋唐长安市民宅院即多植槐树,所谓“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①,明代西安城当与此差相仿佛。

与槐树相比,柳树材质的实用性较差,但作为绿化树却更具观赏性,而且更适应湿润多水的环境,所以柳树往往出现在坑、池之畔,大街小巷沟渠两侧,而在宅院中则很少见到。柏树因

① 王维:《登楼歌》,《全唐诗》卷 125,第 1262页。

其具有庄严、肃穆之象,在西安城内并不多见,除王府、文庙以外,多出现在寺观内或具有祭祀性质的特定地区。

除柳树、柏树等观赏树种以外,其他树种都更注重实用,枣树、柿树作为果树的经济价值自不用说,就是皂角树,除其高大的树干、伸展的树冠可供夏季纳阴乘凉外,皂角在当时也应是洗涤衣物的良好去污材料。洗衣时用皂角去污的方法在关中地区一直至 70 年代后期还能见到。

东关城内的果园在明代西安城市绿化中格外引人注目,尽管枣园、柿园等是以城市农业——果园的景观形式出现,百姓主要是利用其经济价值,但作为西安城人居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单一型树种、一定面积内密植为特征的果园与东关居民区、商业区和谐共处,使其作为“斑状绿化区”的绿化效果也堪与“街巷绿化带”相提并论。

当然,基于城市发展的时空规律及农业自身特点,城市农业并不能为城市绿化提供长期而持续的保障。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东关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到明代中后期由于龙首、通济二渠水量的减少以至于渐渐湮废而导致的灌溉困难,都使得东关果园的发展难以为继。到清代,枣园、柿园等当仅为地名,而真正的大面积果林可能已然消失。

表 1 明代西安城与绿化相关街巷地名一览表

街巷地名	位置	得名起因
东柳巷	位于东大街西段南侧,西起北柳巷,东至骡马市。	明代以西端水池旁植柳树得名。清嘉庆《咸宁县志》按方位分为东、西、南、北柳巷。
柏树林	位于府城东门大街中段南端履门大街之南。	明正統(1436—1449)年间,知府孙仁益在文庙四周广植柏树,得名柏树林。
枣园巷	位于东郭城西南,古新巷北,东西巷,东起东郭南大街,东近府城东城壕。	巷因有枣园而得名。
柿园巷(坊)	位于东郭城东面中部,东西巷,西接东郭东大街,东至曹家集。	巷因有柿园而得名。
东、西早慈巷	位于府城西门大街西段路北贡院东(西)侧。	开拓于明景泰年间,因靠贡院考场,为防止越墙舞弊,在院墙头插满枣刺而得名枣茨(刺)巷。1917 年雅化为早慈巷。
二府园	南起二府街,北至市法院家属院。	相传建于明洪武年间,以秦王朱棣二子府第的花园得名。

注: 本表主要依据西安市地名委员会、西安市民政局编《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内部资料), 1986 年)及《明清西安词典》(张永禄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制成。另据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可知明代西安与绿化相关的街区名还有双桂里、柳巷坊、枣茨坊、柿园坊等。

三 明代西安郊区园林(别业)与绿化带的主要类型及景观特征

1 明代西安郊区园林

以用途而论,约可分为别墅(别业、小居)和寺观类园林两大类。

(1) 明代西安郊区别墅园林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鼎盛时期,物质财富的富足,使人

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消费风气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痼疾,如喧闹、嘈杂、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等等,于是社会中上层又向往乡村野趣,追求桃花源式恬淡宁静的生活。所谓“人居城市,无论贵贱贫富,未免尘俗嚣喧,……我愿去郭数里,择山林清嘉、林木丛秀之处,不见县官面目,躬亲农圃之役,伏腊稍洽,尊俎粗供,啸歌檐楹之下,以送余年,其亦可乎?”^① 这应是明代许多人的共同心声,遂成为城郊园林大兴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广泛基础。

明代西安郊区园林在四郊之地均有分布,而以南郊最多。西安以南之地自秦汉时起便是皇家苑囿密集分布的地区,至隋唐时代,各类园林别业更是举目可及。明时宗室文人亭馆离宅亦多有兴建。据明人赵涵《游城南记》载,“(由华严寺)循原西行数里有宗尉怀斛庄亭馆,参差出半山,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极幽僻之致”^②。城南园林别馆的兴起与这一带独特的地形地貌及沿坡崖处泉水出露较多有密切关系。所谓“南崖神禾,北崖杜陵,沿崖出泉最多。野馆亭榭与村烟相间,水中流,两岸皆稻畦蔬町、蹊桃堤柳、渔歌樵唱、雁阵鸥行,入晚尤佳,为城南第一名胜”^③。这些园林一般都没有宏敞、华丽的建筑,宅居多简易朴素,园圃也多以自然田园风光为特征,从而与当地农业景观融为一体,取境悠远,宛若世外桃源。在郊区建别墅者一般非富即贵,如秦简王时有宗室在西安西北郊建别墅者,朱诚泳《过雍世伯别业》诗“邯郸梦破小功名,别墅新开近斗城。一井晓烟桑叶暗,半檐晴日杏花明。吟边杖履恣游乐,尘外轩车绝送迎”^④,就描述了汉长安城遗址附近的一所别墅极富诗情画意的场景。

西郊则因有泔水穿流而成为一些人建造别墅园林的佳地。如“致政康都阆别业去咸阳仅十里,其居枕泔水,甚有幽致。”以至秦简王赞叹不已,“因贻以诗:‘将军别墅枕泔河,此日停骖试一过。绕合笙簧流水急,当门图画好山多。暖风鸡犬鸣深树,斜日牛羊卧软莎。应有杜陵余兴在,东桥欲问讯如何。’”^⑤ 西安城郊的别业(别墅)实际上即为小型园林,宗室、官宦、文人等之所以选择郊区建造别墅,一方面是出于郊区自然风光优美如画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城中寸土寸金,地价过高之故。

郊区园林别业最主要的景观特征就在于处处显露出自然的气息,绝少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夕阳流水、一井一桥、鸡犬牛羊皆能成为乡间园林的构景要素。

(2) 明代西安郊区寺观园林

明时城南寺观众多,且多是隋唐以来的千年古刹,往往庙宇恢弘,气象严整,高塔入云,古木参天,每逢节日庙会,游人如织,是郊区园林的主要组成部分。闻名者如慈恩寺、荐福寺、兴善寺、华严寺、牛头寺、草堂寺等。

秦简王《游兴善寺》诗咏云:“兴善古名刹,僻居城南隅。译经自唐代,遗迹于今留。绿树荫苔迳,闲然清且幽。……乐哉二三子,闲暇从我游。行歌足胜览,乘兴还登楼。仰视玉宇阔,俯

① (明)莫是龙:《笔尘》,《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明)赵涵:《游城南记》。

③ 康熙《咸宁县志》卷1“樊川晚浦”,又“杜曲花光”云“即北杜故里,延袤十里,率种桃,春中烂漫如锦。”

④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5。

⑤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10。

瞰清江流 南山当目前,雨过晴岚浮 无边好光景,收拾归吟眸”^①,就描写了这样一幅悠游兴善寺园林的场景。从明人赵涵《游城南记》中可以看出,此时城南(及西南)一带具有园林化特征的寺观就有大兴善寺(“后阁巍然,铜佛像并转经藏,疑皆昔时物,……万历甲辰重加修饬”)、普光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 下寺金壁庄严,为长安诸寺之冠……最胜者寺内莲花池,大数亩,中作藏经阁,环以廊百楹。游人至此,恍然有出世之想;上寺距下寺五里,石蹬参差,飞梁跨壑,长松古柏,翠壁苍崖,应接不暇……”)、华严寺、牛头寺(“寺地胜如华严,而庄严过之,盖亦秦邸香火院也。”)、百塔寺(“亦入秦邸,故庄严稍胜,殿壁金元旧画,雄伟可观”)、崇仁寺(“今为秦邸香火院,缔构丹碧,长安城诸寺不及也。”)^②。普光寺作为明初来自西方“与秦愍王有宿世缘”的无坏禅师驻锡之地,寺中环境因有大面积的莲花池而使其他寺观相形见绌。莲花为佛教崇信的圣洁之物,普光寺以地利之便而拥有“青苍远接千章树,红白新开万朵莲”的美景^③,在池中心建造藏经阁,的确形成了宛若东海蓬莱的佛家仙境,难怪游人至此,恍然有出世之想。明代郊区寺观园林的建设多与秦王有关,凡可列入秦邸香火院的寺观,园林化特征均较突出。寺观园林多以佛塔、经阁、壁画、佛教遗迹及庙宇建筑的庄严取胜,当然,为营造清净和瞻拜的环境,绿化多有松柏,花草也多为朴素常见者,既无王府园林中象征大富大贵的牡丹,亦无城市内宗室园林或文人宅第园林中借喻宣扬忠孝的萱草之类。限于佛教寺院的传统建筑理念及其财力,此类园林中几无引水作池的现象,这与城市园林的面貌有很大的不同,景观层次相对单一,缺乏变化。

2 明代西安城外绿化带的建设

明代西安城外主要有两条规模较大的绿化带,一为大城护城河沿岸,一为通济渠沿岸,均为成化元年项忠、余子俊等当政者主持造植。

西安护城河沿岸的大规模绿化始自明成化年间,这是作为成化元年(1465)陕西右副都御使项忠及西安知府余子俊等主持开凿城西通济渠引水入城水利设施的辅助工程。之所以到成化元年才出现城河的大规模绿化,是因明前期西北地区仍有元残余势力及蒙古敌对势力的不断骚扰,西安作为西北军事重镇所要承担的防御任务甚重,城墙与城河外围必须保持视野的开阔以利于军事防御,而绿化势必会削弱这一特征,但至成化前后,西北地区承平日久,城河的防御性相对减弱,加之城市环境和城市商贸的发展需要,也都使城河的绿化势在必行。前述秦王府城河在成化年间的大规模绿化也有相同的原因。

项忠在其《新开通济渠碑记》中详载护城河沿岸绿化的分段、分工及其收益的分配等,“本院定行事宜,自西门吊桥南起转至东门吊桥南止,仰都司令西安左、前、后三卫栽种菱、藕、鸡头、茭笋、蒲笋并一应得利之物,听都司与各卫采取公用。自东门吊桥北起转至西门吊桥北止,仰布政司令西安府督令咸、长二县栽种,听西安府并布、按二司采取公用。若是利多,都司并西安府变卖杂粮,在官各听公道支销。”从这一记载分析,绿化工程由西安驻军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但是从工程量上来看,咸、长二县承担的绿化带长度约是三卫的一倍。因而地方政府是这一

①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2又卷《游兴善寺》“迢迢一径绿苔封,步入烟霞杳霭中。丈室老禅忘色相,庭前红杏自东风。”

② (明)赵涵:《游城南记》。朱诚泳:《小鸣稿》卷1《恩赐览胜录》载“普光寺,有池曰仰天池,实予始祖愍望奉大雄氏处也,允为诸刹首称。”可知普光寺也是秦邸香火院之一。

③ (明)朱诚泳:《小鸣稿》卷5《再游天池普光寺忆僧性空》。

次绿化工程的主体,而军队则起了辅助作用。在护城河绿化带的建设中,通过“都司各卫”与西安府及咸、长二县,即军队与地方政府的明确分工,实现各自的绿化受益,就充分调动了绿化的积极性。

可以推定,城河的绿化不仅是河中栽植有菱、藕等水生植物,作为通济渠绿化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城河两岸无疑也植有一定数量的柳树。由此可见,护城河绿化工程已经突破了单纯环境美化的目的,而是达到了其从内到外整体绿化的效果,这一措施不仅美化了西安城周环境,形成一条环城的绿带,而且有效利用了城河大面积水域,种植各类水产品,供应西安市场,在收到生态环境效益的同时也获取了可观的经济回报。

通济渠沿岸则以种植护岸保堤的柳树等树种为主,绿化长度达到约 25 里左右,即“自丈八头到城两岸栽树”^①。项忠《新开通济渠记》中曾规定“西安府呈行事宜,自皂河上源胡公堰起至西城壕长七十里,每长一里于沿河附近定人夫二名,通设老人四名分管,时常巡视,爱护修理。”这一措施虽然主要是针对渠道工程,但沿岸树木绿化无疑也在“时常巡视,爱护修理”的管理体系之中。

综合分析明代西安城乡园林的各自特点,可以发现,城市园林虽也同样具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特点,但人工建筑物相对较多,规划、构景方面也多具匠心;郊区园林则取景开阔,多依山傍坡,处河之侧,建筑物较为简易、质朴,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极佳,规模一般也较小。郊区园林在城市四乡均有分布,南郊以其近郊地形高下有致、河川交错,远郊旷野平畴、黛山如屏的优点分布较多,这也与千余年来长安(西安)郊区园林的分布大势相一致。

四 结 语

明代西安园林建设的成就达到了唐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在城市水利建设为之提供了较好的水源基础以及城市经济相对宋元繁荣的因素之外,还基于明代园林建设水平的整体提高,这一时期,不仅以都城北京和江南的园林建设实践为代表,更出现了众多的如明人计成所撰《园冶》一类的总结我国数千年来园林建设经验及理论的造园论著,因而西安园林建设的又一高峰出现在明代也与我国园林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

总体而言,西安园林在明代近三百年间中的发展也并不均衡。西安地处西北,园林多以池沼为构景中心,以从雄浑中显其灵动。因而水源的兴废直接影响到城市及郊区园林的兴衰,若水源断绝,无水可引,园林便日见衰毁,无甚可观。以成化元年通济渠的开凿为界,明前期虽然也有城东龙首渠引水入城,但因引水量不大且不稳定,对于城市园林的建设杯水车薪,尤其是龙首渠主要供给城东半部汲引等用途,城西部园林建设就相对缓慢,通济渠开凿之后,引水量大增,所谓“烟火万家兮仰给无穷”^②,这就不仅带来了城西莲花池等园林的兴盛,同时也为城东区以秦府为代表的众多园林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至明代后期,由于秦岭森林开始遭到流民棚户等的大规模砍伐,引起两渠上源水量的减少,引入城中的水量也随之不敷所用。至明末,城内园林则因缺水多已难寻繁华,甚至昔日碧波荡漾的莲花池也出现“自渠阻淤,池久涸,瓦砾委焉”^③的景象,充分体现出水源供给的充足与否对园林兴衰的重要意义。

① (明)项忠:《新开通济渠碑记》,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碑拓本,轴 1061

② (明)项忠:《新开通济渠碑记》

③ (清)贾汉复:《放生池碑记》,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13《古迹一》引。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1. Preliminary Study on Xi'an Residence Environment in Ming Dynasty—— Landscape greening Mostly (by Shi Hongshuai)

On the basis of a lot of relevant historical and local chronicles materials, the paper researched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 and water source foundation, the basic types and landscape characters on greening of Xi'an Area in Ming Dynasty carefully. Moreover, the paper also restored the appearance of Xi'an dwelling environment condition in Ming Dynas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of Northwest China at some ext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environment in harmony.

2. The Resident Environment in Countryside, Town and City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Landlord's Daily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Activity Scope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Hong Pu)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behavior of people. It was a widespread historic phenomenon that the landlords moved from rural areas to towns and cities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affected the daily life of the landlords not only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but also in the regional range of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Thus it resulted in freedom of personality and increase of ability of the landlords who leaved away from the rural areas in Jiangnan.

3. The Structions and Changes of Ancient Dikes in Jiangsu Area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by Ling Shen)

During historical periods, the ancients in Jiangsu coastal area put great stres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ikes. Befor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ikes were mainly scattered in Hai Zhou Bay area. In Tang Dynasty, Licheng built Changfeng Dike on East Sand ridge. During Song Dynasty, Fan Zhongyan constructed Fangong Dike on the base of Changfeng Dike. Having been reconstructed many times afterwards, it became a huge defence against tides, running from Miaowan in the north to Lusi in the sou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dikes in North Jiangsu has not only promoted exploitation along the coast but also offer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dikes.

4.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Earthquakes in the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during Tang Dynasty (by Tong Shengjiang)

China, a multi-earthquake-happening country, lies in the earthquake belt along the west of the Pacific Ocean. Many fearful earthquakes happened in our country during the last thousands years. Basing on the avail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requ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arthquakes happened during Tang dynasty (A. D. 618- 907).

5. Study On the Tree-planting and Forest-protecting Action in Genealogy and Clan-dharm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by Guan chuanyou)

Genealogy and clan-dharma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Pudie family series, and the